

第 14 卷第 2 期 2021 年 06 月

Vol. 14, No. 2, June, 2021

国际高等教育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在后疫情时代争取资金和消除不平等..... 39

从公平角度看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41

后疫情时代下的“未来学”和高等教育..... 43

国际问题

发展全系统的卓越教学方法..... 45

高等教育的信息与市场..... 47

高等教育冷战?

中国与全球的关系：高等教育冷战? 49

中外科技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52

中国学生停止赴美留学计划..... 54

面向未来的中德高等教育合作..... 56

博士教育：全球的重新思考

博士教育：全球视野..... 58

非洲：博士教育面临的资源挑战..... 60

日本大学博士申请人数下降——创新危机? 62

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质疑

学术腐败能根除吗? 64

买还是不买? ——在乌克兰“投资”一篇论文..... 66

虚假的机构隶属关系和博弈性大学指标..... 68

国家和地区

巴西高等教育的悲剧..... 70

从迷雾中崛起：法国大学和全球排名..... 73

尚未涅槃：美国大选对国际高等教育的影响..... 75

在后疫情时代争取资金和消除不平等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新冠疫情为人们在决定并预测高等教育未来作用的方面打开了潘多拉之盒。一方面, 一些人预测一切都不会改变, 危机过后一切都会“一如往常”。另一方面, 有些人预见高等教育将经历一场彻底变革的革命。相比之下, 这些保守的观点目前似乎更为现实。《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 和其他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认为, 剧烈的变革是可取的, 也是不可避免的——重新构想高等教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这已经不是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机构之一的大学 (另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会) 第一次呼吁进行革命性变革。不久之前, 许多人认为慕课将改变高等教育——当然, 这并没有发生。正如亨利·曼斯 (Henry Mance) 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20年9月18日发表的“新冠疫情下大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Age of the Covid-19]) 中所写的那样, “事实上, 新冠疫情突显了对大学工作的需求。”在欧洲和北美的新学年开始时, 政府和机构领导人一直在呼吁重新开放校园, 一些教师和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在线教育在短时间内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用来应对第一波疫情。但很明显, 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仅是教育提供者。它们是教师和学生生活的社区, 不仅在教室里, 在

教室外面更是如此。经合组织 (OECD) 在《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报告写道, “学生们不太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消费’在线课程内容。学生去大学是为了结识优秀的人, 与教师进行鼓舞人心的对话, 在实验室与研究人员合作, 并在校园里体验社会生活”。尽管有人担心本地和国际学生的人数会大幅下降, 但在新学年开始时, 包括国际学生在内的学生人数似乎有所上升, 尽管国家和高等院校受到的影响不同。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失业时期, 教育成了另一种选择。未来几年将会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 特别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

回归“正常”是要有代价的, 这是肯定的。在那些开设了校内或混合教学的大学, 学生的热情导致了无视规则和对安全的忽视, 从而导致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大幅上升。此外, 校园生活的复苏主要体现在高收入国家的顶尖大学, 加剧了不平等和排斥。由于新冠疫情产生的额外管理费用、收入损失以及越来越多的预算削减,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限制。由于这些原因, 虽然不太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但已不可能回到疫情前的现状。变化将会发生, 改革将会实施, 但须要逐步地积极引导和关注学生、教师和外部世界的声音。

科研的未来

尽管在世界上两万所或更多的大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有重大的研究任务，但在大学中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研究型大学部门和社会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目前，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从事新冠肺炎的研究，全球媒体上出现的公共卫生专家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一般来说，大学受到保护，不受科学政治化的影响，这在一些国家很明显，而且大学被认为是解决现代最严重的全球健康危机的关键贡献者。新冠肺炎突出了研究和研究合作的重要性。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 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 写道“在困难时期，全球研究合作是一个好消息”。约 30 个目前正在研究疫苗的项目，它们都依赖于跨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国际合作关系，开展这些研究合作都需要在世界不同地区拥有最好的人才、先进的设备和测试机会。这项努力是全球性的，说明了科学和学术全球化的必要性。

新冠疫情危机还表明，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是跨学科的，大学是唯一能够轻松汇集硬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机构。此外，大多数研究型公共卫生学者都来自大学，而学术型公共卫生机构一直在最前沿了解新冠肺炎的各个方面。来自一系列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提供所需的专业知识。

挑战

但也有一些担忧。经合组织警告称，如果新冠疫情后国际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数量和质量下降，那么研究也将显著减弱，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占很大比例。大卫·马修斯 (David Matthews) 在他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发表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上的文章中预测经费福利是相对的。由于欧洲领导人就重建资金达成的协议，欧盟委员会 2021 ~ 2027 年的研究预算可能会从 940 亿欧元削减至 860 亿欧元。还有人担心民族主义行动会限制国际研究合作。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经费本已有限，现在可能会进一步减少。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主要是在硬科学领域，这是由于近期对研究型大学的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复苏的早期迹象所显示的，但跨学科研究如何进行仍拭目以待。

新冠疫情极大地加剧了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门内部（即学生、教师和机构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应对这一消极趋势“需要一个长期的愿景，需要结构上的改变，以及需要来自世界各地所有学者、利益相关者、机构和国家的集体承诺”（请见《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徐昕“新冠疫情对全球科研的影响”一文）。

从公平角度看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贾米尔·萨尔米

贾米尔·萨尔米 (Jamil Salmi): 全球高等教育专家、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员、智利迭戈波塔利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名誉教授

电子邮箱: jsalmi@tertiaryeducation.org

虽然新冠疫情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冲击,但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互联网部署有限和宽带容量低的国家,在线学习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由于缺乏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充足的资源,低收入国家的学院和大学一直在发展高质量的远程教育项目上挣扎。

短期效应及反应

- 关闭校园并向在线教育过渡: 不同国家和教育机构对此的准备程度存在高度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和学院面临着严重的 IT 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接入困难。
- 对学生的影响: 校园的突然关闭和网络教育的迅速转变带来的混乱局面扰乱了世界各地学生的生活。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他们遭遇了经济困难、联系困难和情感困扰。
- 评估和考试正在转型: 许多高等教育机构一直在艰难地做出关于在线评估和作弊风险增加的选择。
- 大学奋起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世界各地的大学作出了重要的回应,为抗击疫情贡献了科学知识和资源,这是一项积极的发展。大学开发了一种更快、更便宜的新冠肺炎检测方法,向医院捐赠了多余的设备,并生产了医疗用品、消毒设备和药品。

长期影响

- 秋季重开: 在疫情仍在肆虐的国家,重开的决定受到政治和经济考虑的严重影响。在英国和美国,由于对新冠肺炎的否认和经济困难的威胁,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拿学生的健康冒险。
- 学习减少与学生失败增加: 在 2019/20 学年,许多学生的学习经历将是不完整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除了对教育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外,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有所上升。
- 资源减少、需求转移、关闭和重组: 危机暴露了许多高等教育系统和机构现有融资模式的结构缺陷。对于完全依赖学费和/或国际学生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来说,经济生存将受到严重考验。大量资源有限的学生可能会完全退出高等教育。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传统上向高等教育划拨的公共资金不足,通常不到 GDP 的 0.5%,其后果可能是可怕的。
- 对科研的影响: 实验室关闭和旅行限制意味着研究人员无法继续进行实验或实地调查,除非有可能进行远程实验室工作和合作。所有研究型大学日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除了与新冠肺炎直接相关的项目外,未来几年资金可能会减少。关于研究成果的数据表明,女性学者受到的影响比男性学者更严重,这反映了

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不平衡。

国家减灾政策

- 财政支持：一些高收入国家迅速批准了对学院、大学和/或学生的经济救助计划。但很少有低收入国家能够提供规模可观的整套支持计划。
- 互联互通和在线教育能力建设：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高校和学生之间的互联互通。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政府已经通过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nation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networks）加强了互联网宽带连接能力。
- 质量保证和评估方面的灵活性：第三类国家层面的干预是努力使质量保证标准和评估方法的应用更具灵活性。

院校减灾政策

- 创新教育方法：简化在线教育过渡的第一步就是提供使用数字平台和应用有效的在线教学技术的速成课程。教学服务功能完善的院校，更有能力支持其学术团体。成功的在线教育体验的核心是课程、教学方法和评估的结合。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应该认识到在线教学不是把传统的讲课内容录制下来并发布在学校的网站上，而是采用一种教育方法，使学生参与到一种更具激励性的教育体验中。最后，许多机构发现加强他们的学术和心理支持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学生个人受到了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同时又在努力适应在线教育。
- 新冠疫情之外的治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了学院和大学校长的领导能力，迫使他们迅速作出重要决定，以保护学术界的健康和保持业务连续性。这

场危机的教训是，必须进行有效和频繁的交流，以诚实和透明的方式解释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未知因素。

- 创造新的经济模式：新冠肺炎后可能会出现新的机遇。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认真对待成人学习者，将其作为目标学生群体的合法组成部分。采用终身学习强调学习者的首要地位，认可在工作中获得的能力，并解决更多样化客户的培训需求。高等教育机构也可以探索联合办学、联合授课、联合研究，更有效地整合人才和财力。
- 强调公平性的回应：在学校关闭后，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减轻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弱势群体学生的困难。财政援助的形式包括额外奖学金、无息贷款和食品银行（food banks，即免费食物供给）。为了减少数字鸿沟，许多机构向学生捐赠设备，并提供互联网捆绑服务，以满足上网需求。

结语

大学的实力从来没有像这次新冠疫情期间这样受到如此艰难的考验。健康危机让我们看到，数字鸿沟和经济不平等是令人不安的现实，直接影响了学生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能力。

虽然世界顶尖大学不太可能遭受不利的长期后果，但对许多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财政生存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数百万资源有限的学生可能会选择退学。

由于新冠疫情暴露了数字鸿沟的严重程度和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使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之间的巨大差距持续存在，因此必须在国家和机构层面考虑采取措施，重点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女性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

后疫情时代下的“未来学”和高等教育

威廉·洛克

威廉·洛克 (William Lock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教授、墨尔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Melbour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william.locke@unimelb.edu.au

没有什么比一场适当的危机更能激发人们对不同未来和新开端的想法。至少,我们现在被告知:将会出现“新常态”,不会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情况。然而,即使在疫情之前,也有很多未来学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分析了高等教育一系列灾难性情景。在这些情景中,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挑战并扰乱公立大学的传统学术惯例、商业模式和工作实践。一些人推测到,这些转变可能会威胁到高等教育的基础、经济价值和社会角色。

这些情况通常包含以下所谓“干扰因素”的某些组合:毕业生就业的转变;提高学生的期望;技术革命,包括在线学习、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扩张与公共融资约束;政策突变;以及日益增长的全球竞争,特别是来自新兴国家私立营利性机构和大学的竞争。现在,前沿的未来学家将新冠疫情造成的快速影响也加入了这些干扰因素讨论,并唤起了人们的焦虑。

未来学家的话语

未来学家,通常是管理顾问、“思想领袖”和记者。他们预测未来将给那些在大学管理和工作的人带来快速和持续的变化、挑战和不确定性。作为回应,这些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和要求。特别是,未来的学术“劳动力”必须更加“敏捷”、“灵活”、“专业化”,

并服从更大的“专门化”。安永会计事务所 (Ernst and Young) 甚至预测,学者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在几所高等教育机构和知识企业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因此,有人认为,必须克服公立大学的保守主义、“竖井心理”(silo mentality, 又称“孤岛思维”)、对跨学科和实用知识的抵制、对“低价”值课程的多虑,当然还有固有的缓慢变化步伐。传统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将不得不被解散。这种观点认为,在全球疫情及其对生命、社区和机构的颠覆中,这些必要的转变将会加速。

一个有缺陷的方法

这些自封的高等教育专家主要对大学校长、政策制定者以及主要利益相关者(如企业领袖和毕业生雇主)进行了访谈与调查。但他们很少征询在高等教育院校工作和学习的教职员或学生的意见,更不要说参考有关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和趋势的现有学术研究。然而,这种“未来学”在有影响力的网络中传播,并开始为机构内当前的战略制定以及国家、国家和全球各级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因此,它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投机营销而不予理会,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对行为和决策具有影响和实质性影响的话语。

“灾难性的未来学”讽刺了现有的公共高等教育模式。大学被认为是传统的“二十世纪”机构,以学术为导向,而不是以学生

或客户为中心。它们的特点是彼此过于相似，并且由不愿改变的老龄化学术劳动力所主导。未来学家几乎只引用以前的管理咨询报告、政策文件和报纸文章。他们反复使用那些已经变得非常熟悉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但坦率地说，这些经不起实证检验。

基于证据的学术工作

未来学家忽略了许多关于学术工作的现有研究证据。例如，他们认为学术职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同质化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长期职位，既从事教学又从事研究。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关于学术“职业”的多样化、进入者的范围之广（包括来自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选择的不同职业道路以及线性学术职业的侵蚀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此外，近年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兼职、定期、临时、纯教学和非终身制的教师都有很大的增长。

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展望未来

与这些说法相反，我们应该根据当前最好的研究证据和对近期、中期和长期过去趋势的分析，对当前情况进行准确的分析。这必须包括对现有有效和成功做法的例子进行严格分析，这些例子可以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初步的说明。欧盟资助的“未来大学”（Universities of the Future）项目和林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ncoln）的“21 世纪实验室”就是两个例子。

更多基于证据的、反复设想未来的方法可以确保我们评估影响当前趋势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甚至是准非法的）因素，以及经济和技术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简化主义的方法，即特权特定的活动以及优先考虑特定结果的决定论假

设。

新冠疫情是终极破坏者吗？

那么，新冠疫情是最终的破坏者吗？这无疑为未来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我们被告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而且，高等教育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紧缩，以及如此多的单个大学裁员，确实是罕见的。然而，在战争之前也有过混乱，包括内战、民族主义运动、入侵、大规模移民，所有这些都对世界各地的大学造成了严重影响。过去也有过裁员。在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紧缩，工作人员转而缩短工作周数，并采取减薪、自愿和强制裁员计划，以换取大多数人的工作保障。

我们还被告知“不会再回到过去的正常状态”，但大多数大学目前关心的是短期到中期的生存，不愿过多地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和操作方式，因为担心崩溃。危机不是开始制定新战略的好时机，即使旧战略可能已经支离破碎。当大学有资金进行创新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但是现在当他们确实需要更新他们的活动时，他们没有资金来投资管理必要的变化。

当然，这一切对管理顾问来说都不是好事，他们将因大学财政紧缩而蒙受损失。所以，也许是时候让大学掌握自己的未来了。

注：本文摘自《为变化的世界变革高等教育》（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章节（由 Callender, Locke and Marginson 主编，2020 年由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课题，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

发展全系统的卓越教学方法

保罗·阿什温

保罗·阿什温 (Paul Ashwin):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教授、教育研究部主任

电子邮件: paul.ashwin@lancaster.ac.uk

有两种方法可以促进全系统的教学卓越,即“范例”(exemplar)和“映射”(mapping)方法。范例方法侧重于在国家层面上确定个别教师或教学卓越中心的具体案例,并在芬兰、德国、挪威、南非和英国等地发挥了作用。映射方法寻求评估整个系统的教学,可以是国家或国际范围。绘制方法的两个主要例子是经合组织(OECD)在英国试点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简称AHELO)和“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TEF)。

本文就以下三个问题评估了现有的范例和映射方法:如何定义卓越教学?如何衡量卓越教学?卓越教学计划如何提升教与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更有效的方法来提提高全系统教学质量的原则。

如何定义卓越教学?

在范例方法下,卓越教学是由那些申请被授予“卓越”称号的人来定义的。这种方法的逻辑是,申请者对自己的优秀之处进行循证陈述。这为卓越教学的各种不同定义提供了发展空间。

相比之下,映射方法明确卓越教学的预期结果,并在整个系统中评估这些结果。例如,在“教学卓越框架”中,根据学生对教

学的看法、学生辍学率和就业结果等一系列指标对大学进行评估。评审人员会先评估院校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然后再考虑院校提交的报告,概述其追求卓越的目标,而院校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是决定其评审结果的最重要因素。

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对教学质量给出明确的定义,这凸显了一个核心矛盾。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卓越教学,那么全系统的计划如何能声称已经确定了卓越教学的发生情况呢?答案是,它们是基于对什么是卓越教学的隐性观点,而这些观点不受公众监督。如果这些方法能够明确地定义卓越教学,明确地与高等教育的教学目的相一致,并表明教学如何有助于学生的成功发展,那么它们将会更加有效。这表明,全系统教学卓越计划的首要原则被定义为:该计划需要给出一个反映高等教育教学目的的“卓越教学”定义。

如何衡量卓越教学?

在范例方法下,申请者建立自己的优秀教学描述,并提供证据来支持这些描述。这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类型的证据,比如学生对教学的评价结果,但申请人往往会选择强调哪些措施并解释这些方法的重要性,以此与其申请描述相符。

映射法倾向于关注学生成绩的共同衡量

标准,无论是在“教学卓越框架”中选择的指标,还是学生在“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等通用测试中的表现。这些方案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即一旦一种衡量标准成为绩效指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标准。虽然一个衡量标准在过去可能与质量共同变化,但当机构寻求最大化其绩效时,它与质量的关系消失了。这可以通过关注对过程和结果的测量来解决,因为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即“修复”系统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际参与提高教学质量的过程。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将结果衡量指标包括在内,而是说,它们需要那些能够证明这些结果是如何实现的衡量标准为基础。

总的来说,需要一系列独立的教学卓越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同时强调高质量教学的过程和结果。鉴于原则一,这些标准须提供证据以说明教学卓越的定义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因此,第二项原则的定义是:全系统教学卓越的衡量标准必须与教学卓越的定义一致,并注重教育过程和教育成果。

如何提升教学卓越?

范例法和映射法是基于如何提高教学的不同观点。范例方法基于一种变革的连锁模型,该模型假设:如果最好的个人、部门或机构能够被识别和奖励,那么他们将分享他们的优秀实践,并帮助鼓励其他人变得优秀。虽然这些方案可以起到传递教学重要性的作用,并为个人和部门带来益处,但它们并不

能提高整个系统的日常教学和学习。

映射方法基于一种变革的竞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最好的机构将得到奖励,其他机构将改进他们的实践,或失去学生并停止提供学位课程。这种方法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既依赖于教学质量衡量标准的有效性、精确性和准确性;也需要申请人使用这些衡量标准作为参考来选择学位项目。但这两种情况似乎都不是事实。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讨论了教学质量的测量问题,研究一致表明学生不倾向于以这种信息使用方式作为参考来做出选择。

这表明范例方法和映射方法都是基于有缺陷的变革理论。在古德哈特定律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另一种方法。如果我们在衡量卓越教学的指标中纳入院校实践的程度指标(这些院校实践已被研究证明能有效支持高质量教学),那么这就有可能会促进其实践工作。基于对整个系统的教学卓越如何提升的回顾,我们将第三项原则定义为:只有在教学实践中有所改进,才能提高卓越教学措施的效果。

注:本文摘自《为变化的世界变革高等教育》(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章节(由 Callender, Locke and Marginson 主编,2020年由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课题,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

高等教育的信息与市场

扬亚·科姆列诺维奇

扬亚·科姆列诺维奇 (Janja Komljenovic):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 (the Lancaster University) 高等教育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 j.komljenovic@lancaster.ac.uk

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市场化。但是, 要想让高等教育市场发挥作用, 仅仅改变一项法律或引入学费制是不够的。在最近出版的《为变化的世界变革高等教育》(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 一书中, 我所撰写的章节研究了市场信息工具的作用。虽然这是一个广泛的类别, 包括从价格标签到购物车, 从电脑屏幕到数据分析, 从公式到排名等等, 但我研究了高等教育中的市场信息工具。通过四个具有启发性的平台分析, 我追踪了这些信息工具是如何创造市场的。

四个平台

我研究中的市场信息工具之一是英国大学统计 Unistats (即现在的 Discover Uni), 这是一个为未来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课程信息的网站, 来自英国。Unistats 有一个面向用户的可视化功能, 以此突出课程项目和大学的特定特征, 同时使其他信息难以找到或无法获得。第二个平台是网络开放课程 Coursera 平台向企业客户传达的营销信息。Coursera 向客户传达的数字和信息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 质量取决于大学的品牌和声誉, 而慕课课程 (MOOC) 的价值取决于所获得技能的货币化计算。第三个平台是关于国际学生招生中介的。这些大学“经纪人”组织的活动充当了市场信息, 代表了大学可以信任的

可靠性。最后, 研究了领英 (LinkedIn) 平台的数据和对劳动力和技能的分析。LinkedIn 的算法基于网络效应, 呈现特定技能的价值, 将候选人与工作匹配, 并提供各种学习和工作机会。虽然这四个平台展示的各种工具在工作方式上各具特色, 但它们也展现了更多的共同之处。

市场工具促使行为者思考计算

市场信息工具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以特定形式表达的现成信息。工具本身正在计算、比较并为个人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例如, 就 LinkedIn 为用户提供的关于他们技能、相关的培训课程和就业信息的数据和建议而言, 都是基于数据演算。这些工具的本质和逻辑对高等教育市场的本质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干预了个人的理性、意义和决策思考。我们不是天生的经济人, 而是在这些工具的帮助下被创造出来的经济人。更重要的是, 我们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经济人, 一种利用市场工具提供的信息和解决方案进行计算的人。

市场信息工具不透明

虽然市场信息工具旨在为系统带来透明度, 且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做到了, 但同时它们也有其不透明之处。在发布某些信息之前, 他们依赖于多个分类步骤。例如, 大

学排名和排行榜依赖于复合的、多方面的衡量标准。最终，人们认为这些排名所展现的信息是客观和可靠的，但在现实中，这些排名也诠释、分类并重新架构这个世界。一方面，市场信息工具的作用是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并使他们能够进行计算性选择；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对个人和院校进行评分和分类的工具。

市场信息工具相互作用并构建新的价值标准

这些市场信息工具以各自的方式决定和构建新的价值标准。例如，大学排名和排名表的标准决定了我们对大学质量的理解。另一个例子是 Coursera 平台，它为企业客户提供了 MOOC 课程的货币化观点。通过这种方式，课程的经济价值比课程带给学生的其他形式价值更为突出，比如知识本身或个人成长。

在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中发现的市场信息工具经常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作用，或者可能市场设置中共享。例如，Coursera 和 LinkedIn 的基础设施通过 Coursera 进行互动，课程参与者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将获得的和支付的证书展现在其 LinkedIn 的个人资料中。另一个例子是招生代理使用 Discover Uni 的网页来建议学生去哪里学习。由于市场信息工具通常具有全球性，这些设备的不同框架和逻辑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变得全球性。总体而言，高等教育市场工具正以个性化、灵活、分类、可衡量和功利的方式描绘着高等教育的价值。

市场信息工具构建社会未来

市场信息工具描绘了一个特定的未来。

当这些工具帮助个人进行计算和决策时，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个想象中的未来。例如，Unistats 提供了关于特定大学特定学习项目毕业生薪资水平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对于未来的毕业生来说都是过去的信息，但它仍然可以被理解为照亮了现实中的未来。每个市场信息工具都描绘了自己的未来。但是，人们共同提出的未来似乎越发具有竞争性、数字化、量化和网络化。

下一步如何进行？

高等教育市场信息工具正在扩大其规模（涉及更多方面的内容）、范围（覆盖更多的元素更多）、跨度（不同工具用相同的数据集呈现不同的数据组合并添加其自己的数据）以及时间性（历史性与未来）。因此，决策者、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用户充分了解这些工具的工作原理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工具有助于以市场化形式创建高等教育部门。在列表中使用哪个分类器或在计算中使用哪个公式是有关系的。这些都不是无关政治的选择。由于不同的工具会产生有不同的后果，批判性地审视它们的性质和影响能使我们更广泛地讨论高等教育市场如何能推进或恶化社会平等与社会正义问题。

注：本文摘自《为变化的世界变革高等教育》（*Chang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World*）一书的章节（由 Callender, Locke and Marginson 主编，2020 年由 Bloomsbury 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的研究课题，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

中国与全球的关系：高等教育冷战？

王俐舟、文雯

王俐舟：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生

电子邮箱：wangliz@bc.edu

文雯：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wenwen@tsinghua.edu.cn

有迹象表明，中国与世界许多地区的学术和科学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本文分析了当前发展的关键方面。虽然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跨文化理解、全球知识生产、研究和出版物发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我们撰写此文时，这种关系正处于一个更为不稳定的阶段。

将中国“影响”排除在美国校园之外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限制国际教育和交流，推进反移民和外国间谍活动的议程。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提出了一项新的移民政策，如果国际学生没有在校园里上课，就会被驱逐出境。不过，在高等教育机构和 20 个州的司法部长提起诉讼后，该政策被取消。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计划对在美留学生实行学习年限最长为四年的规定，以防止外国竞争对手利用美国的教育环境。

更多的行动针对的是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理由是一些人可能获得了美国敏感的技术、数据和知识产权。2020 年 5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影响了大约 3000 到 4000 名学生。不久

之后，美国撤销了 1000 多名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签证。此外，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学生在美国机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秋季学期开始后，北德克萨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Texas）终止了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 15 名研究人员的交换项目，并要求他们在 30 天内离开美国。此外，联邦官员已经终止了在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并禁止中国外交官在没有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访问大学校园。

被许多特朗普政府官员视为重要战场的大学正在接受审查，因为它们的实验室为未来的互联网技术、医学、战争和经济开发关键工具。美国教育部已经在调查包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在内的十多所大学的外国赠礼与合同，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这些机构需要提交过去十年所有外国礼品和合同的文件、所有访问期间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学者的联系方式，以及访客与中国政府或军方的任何联系，政府（不是大学）在签证过程中筛选这些信息。

世界各地

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就外国对教育领域的干涉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大学与中国的

联系 (近 15 万名中国留学生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部门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的学费) 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审查。在加拿大, 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警告称, 中国的“千人计划”使用了“腐蚀性战术, 旨在推进中国的经济和战略目标”, 并对参与该计划的加拿大教授表示担忧。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语言文化交流和输出的最重要场所, 正在世界范围内面临关闭。美国国会阻止孔子学院获得国防部的某些拨款, 这一两党战略导致许多孔子学院关闭。比利时、德国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大学和公立学校也终止了与孔子学院的关系。瑞典关闭了所有孔子学院和课堂。

在欧洲, 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负责研究和创新的总干事对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不平衡关系 (包括开放数据、研究合作和学术流动) 提出了担忧。在强调继续合作的重要性的同时, 布鲁塞尔正在创建一个共同框架, 将更明确地界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如何与中国进行合作, 并考虑到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

此时的中国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蓬勃发展。中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在全球排名中表现强劲。中国科学家, 尤其是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 (STEM) 领域的科学家, 不断发表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和出版物。中国有近 50 万名国际学生, 已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

与此同时, 最近的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和国内政治敏感性也影响了中国的大学。中国研究人员和学者寻求国际科学生产和交流的明显障碍是获取信息。虽然每个人都加入了 Zoom 会议的虚拟世界, 但在访问时以及在访

问其他流行的研究、交流和社交媒体平台还存有一些困难。

自 2016 年以来, 为了提高整体软实力和学术质量, 中国一直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于 2020 年春季宣布的《研究评价改革》, 预计将停止对科学引文索引的吹捧, 并鼓励学者们在自己的语境中, 用中文解决中国的关切。同时, 也鼓励学者们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向外界“讲好中国故事”, 而不是“戴着美国的眼镜去解决中国问题”。这一举措可能会对以英语为主导的学术知识体系以及影响国际合作有一定影响。

影响

新冷战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 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个人与机构。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仅在美国, 2018 年就有超过 36 万名中国留学生, 其中研究生项目的中国留学生多达 13.34 万人。90% 的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会留在美国, 成为顶尖科学家、研究人员和教授的主要来源, 特别是在 STEM 领域。在中美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 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意愿和信心下降。许多 STEM 系所已经注意到, 申请他们博士项目的国际申请者数量在减少。

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 许多学生更愿意在态度和政策更友好的国家学习, 毕业后在那里工作, 比如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美国乔治敦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 自 2017 年以来, 美国居民成功申请加拿大主要技术移民项目的人数增加了 75%。所有的增长都要归功于非美国公民申请者, 其中许多人在美国受过教育。

在院校和学者方面, 提交文件、报告外

国影响的繁琐程序可能会妨碍学校和学者们发起和邀请国际合作。

模糊的未来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

了全球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尽管一些国家将与中国的合作定义为零和的，但国际科学合作产生的是正和的结果。无论外部的政治经济环境如何，高等教育机构都应该坚持自由、批判性思维和追求真理的基本价值观。

中外科技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anthony.welch@sydney.edu.au

美国决定撤销 1000 名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 是最近加强对中美科技研究关系限制之一。早些时候的行动包括美国政府逮捕几名没有承认接受过中国研究资金的 (在美) 华人科学家,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人才计划。

但这种行为, 包括起诉不承认军事关系的中国研究人员, 受到了一些美国研究人员的批评。他们提出了中国医学研究人员被默认怀疑的例子, 仅仅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大型中国医院与军方有某种联系。此前, 美国曾拒绝向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 (STEM) 领域的中国研究人员发放签证, 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制造 2025”政策有关的研究人员。该政策优先考虑了关键的高科技领域: 如 IT、机器人、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语言、不同的认识论和解释框架、审查制度等)。

限制传播

美国的行动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的一部分,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是一场科技战争, 甚至可能是一场意识形态冷战。白宫 2020 年的“战略方针” (Strategic Approach) 文件中提到的研究列出了盗用技术、窃取知识产权、违反机密性和未披露外国利益。但是限

制国际研究合作的措施正在蔓延。欧盟与中国研究人员的实质性和长期合作最近受到了欧盟委员会研究和创新总干事让-埃里克·帕奎特 (Jean-Eric Pacquet) 的挑战, 他警告称, 中国方面的科学数据缺乏透明度, 并限制了几个最强大的科学领域的合作。据帕奎特说, 欧盟不再相信与中国的科学联系是对等的。他认为, 虽然进入欧洲是自由和开放的, 但进入中国是“繁琐的, 有时受到限制”。这些担忧, 包括对强制技术转让的担忧, 预示着一个即将出台的框架, 将更明确地界定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包括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与美国一样, 欧盟在科研合作上立场的改变是其更广泛转变的一部分: 从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 到 2019 年 3 月将其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日本也在考虑加强对中国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的限制, 以阻止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制造等领域的高科技研究泄漏。拟议的指导方针将加强签证审查, 并要求日本大学和科研机构申报所有海外研究收入。但是, 尽管 2017 年在 39473 国际研究人员中有 6313 名中国研究人员, 但尚不清楚他们中有多少人专门研究敏感的高科技领域。此外, 一些日本科学家表示担心, 保护敏感研究和加强研究完整性的措施不应限制开放的科学和创新。

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干涉声中，澳大利亚提议对外国影响进行议会调查。调查特别包括了澳大利亚的大学，并列出了对研究合作的担忧。虽然没有具体提到哪个国家，但中国显然是目标。两名被誉为扩大澳大利亚在华研究的中国著名研究人员成为最初的目标，他们的签证被取消，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人相信国家正在实施一项复杂的策略。在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re）的资助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于 2019 年开发了一项国防大学追踪系统：一个涉及军事或安全相关科学技术研究的中国机构的数据库。该网站包括近 100 所大学、50 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构、3 家国家安全机构和 12 家国有国防工业集团的个人条目。

与美国不同：欧盟与亚洲

美国正在向其所有盟友施压，要求它们追随美国的脚步遏制中国，包括在研究合作方面。日本很可能效仿。但中国仍热衷于开展国际合作，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或亚洲大部分国家希望如此严格地限制自己的选择。举例来说，选边站队将与东盟长期以来想要在两个日益敌对的超级大国之间最大限度地争取回旋余地的愿望大相径庭。东盟成员国中没有任何想要限制与中国进行研究合作的迹象，中国实际上是许多东盟研究体系的主要知识伙伴。例如，就连与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历史的越南，也没有表现出想要削弱与经常惹麻烦的大国邻国间研究关系的迹象。此外，几个东盟系统集聚了大量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海外高技能人才。

风险

上述例子往往表明，国家安全问题主导了国际研究合作的决策。但也存在相关风险。第一，“婴儿可能会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比喻切忌不分良莠，好坏一起丢掉）”。我们显然需要的是，在将敏感的高科技项目与其他许多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项目区分开来时，需要更加周全的计划。正如研究中国科学崛起的专家、苏州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前主任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最近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一个全面的阴谋，太不现实了。”

这个方法的第二个风险是，许多有天赋的中国研究人员可能会决定不去美国或其他有类似限制的系统。或者他们可能会离开美国：已经有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一些华裔研究人员正在离开。其他国家则将他们的研究合作转向日本、英国（然而，英国最近公布了选择性禁止的学术批准技术计划）或欧洲。正如一些美国研究人员所警告的那样，这一结果可能代表着中国的胜利，但对美国的研究来说却是一个净损失。

最后一种风险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全世界一些系统中的崛起。与此相关的将国家安全凌驾于外交和学术关切之上的做法，可能会破坏完善的双边和国际研究网络，这些网络越来越多地支撑着许多全球研究产出。当有三分之一的全世界所有出版物由来自至少两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时，当中国和美国在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互为最大的合作者时，把世界科学大国之一中国所做的众多贡献排除在外是明智的做法吗？

中国学生停止赴美留学计划

万晓峰

万晓峰：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招生副主任、国际招生协调员

电子邮件：xwan@amherst.edu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数量急剧增长。根据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2018/19 学年，约有 37 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 年他们为美国经济贡献了近 150 亿美元，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但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今年 6 月，中国升学指导协会（China Institute of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36% 的中国高中生表示，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计划。在他们众多的担忧中，85% 的人指出他们最担心的是生活在美国的潜在健康风险。近一半的人还表示，不确定的签证政策和反亚裔种族主义是他们的主要担忧。

5 月 29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公告，禁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理由是担心知识产权和技术被盗。根据该公告，截至 2020 年 9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撤销了 1000 多个不符合签证条件的中国公民的签证。这些举措加剧了中国学生的担忧，他们担心，如果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专业，他们将面临更严格的签证审查，可能会颠覆他们在美国学习的多年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继续深度下滑，针对中国学生的敌意政策以

及利用他们作为政治筹码的担忧，进一步让中国家庭感到不安。

此外，美国各地的疫情正在肆虐，反亚洲种族主义攻击（包括言语和身体攻击）也在激增，而煽动这种攻击的正是（前）美国总统，他多次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这些都是中国父母在权衡送孩子上学的利弊时深感不安的因素，他们中的许多孩子都出生在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下。

是否已经到达谷底？并没有

在谈到当前趋势对美国高校招收中国学生的潜在影响时，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咨询主任 Frances Zhang 表示“冬天来了”。她补充道：“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数量将受到延迟影响。真正的下降将在两三年后，即当现在的九年级和十年级学生进入大学时会显现出来。”

近期数据显示，与 2019 年相比，北京的中考考生数量增加了 20%，上海增加了 15%。然而，据报道，美国各地公立和私立高中的许多国际项目在传统招生季节过后很久都未能达到招生目标。

最近，在阿默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和耶鲁大学与中国高中校长举行的联合研讨会上，来自西安一所著名公立高中的校长感叹，他们的国际项目只实现了 40% 的招生目

标。为了留住已经入学的学生，学校不得不在课程中增加高考课程，以便学生仍有资格申请中国大学入学，这对学校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举措。家长们曾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他们的孩子退学。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英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然而，即使是那些只提供 A-Level 课程并将大部分毕业生送至英国的学校，入学人数普遍下降也已司空见惯。今年，一所选拔性很高的英国独立学校在江苏省的分校的高中入学人数下降了 50%。

美国仍然欢迎国际学生吗？

中国家庭的一个根本担忧是，从整体看，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地方。政治和文化差异可能在这里发挥了作用，因为许多中国家庭将特朗普政府的仇外言论与公众舆论联系在一起，包括高等教育机构。

最近，反对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不允许国际学生在美国本土只选修在线课程的规定而提起的诉讼，由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和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倡导，向中国家庭表明了美国政府并不能控制高等教育机构对国际学生的态度。诉讼本身和随后的胜利与该系统的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包括微信和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学招生和中美关系未来的广泛

错误信息，已经在中国家庭中引发了对选择美国留学是否明智的担忧。北京一所非常著名的公立中学的校长在最近的校长研讨会上表示“我们希望美国大学和中国家庭之间能有更多直接的交流。我们学校的家长们都知道，美国大学仍然欢迎他们，他们不会轻易被中国网络上的误导性信息所激怒”。

未来前景

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家庭仍然认同送孩子去美国学习的价值，因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现和提供了许多灯塔般的理想和机会。尽管当前的政治和健康危机的影响似乎是严峻的，而且无疑将是持久的，但中国家庭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愿望不会改变。

话虽如此，未来几年招收中国学生可能会比以往面临更多挑战。美国如何控制疫情是重建大家对进入美国信心的关键。在没有国家领导来控制病毒的传播和接纳国外人才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家庭不会关心国家提供了多少资源，除非他们知道国家多么关心他们子女的福祉，特别是在全球疫情期间。作为第一个接触点，招生官在表达官方欢迎国际学生的立场和官方直接支持国际学生的承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避免过滤信息，消除对在美国学习的任何疑虑和误解——这样中国学生不仅会想再次来到美国 (我相信他们会这样做)，而且会在我们的校园和其他地方有尊严地茁壮成长。

面向未来的中德高等教育合作

马瑞克·瓦勒斯

马瑞克·瓦勒斯 (Marijke Wahlers): 德国校长会议 (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 国际事务
部门负责人

电子邮箱: wahlers@hrk.de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德国和中国大学之间的跨境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发展确实可以被称为一个成功的故事。由于当时的整体政治条件,德国校长会议 (German Rectors' Conference)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记载了不到 100 份德国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协议。仅仅 20 年后的 2000 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三倍。今天,又过了 20 年,大约有 1400 份合作协议,涉及 200 多所德国大学和近 400 所中国大学。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德国和中国学术界之间有一座稳定的桥梁。起初,伙伴关系往往基于单个学术人员之间的双边协议,而现在它们涵盖了整个合作活动的范围,从单个学生和研究人员流动、联合研究项目和博士项目到联合研究和创新举措以及跨国教育的提供。由于中国的合作伙伴很早就认识到了德国大学在应用科学方面的巨大潜力,德方相当平均地参与到了与中方所有类型院校的合作

平衡利益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座共同建造的桥梁上有一些裂缝,这些裂缝有些比较小,有些比较大。例如,在学科方面,合作项目相对集中在某些领域,即自然和技术科学、经济学和法律。时至今日,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这些项目中的代表

性不足。在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流动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众多领域的明显研究实力,并(还)没有使得前往中国的德国学生和学者明显增加。

此外,有迹象表明,至少在早期阶段,管理合作的制度安排没有充分考虑德国大学的一些想法或它们所获得的利益。需要在机构和系统两级采取有远见的战略来抵消这种不平衡。早在 2005 年,德国校长会议就已经在关于中德合作项目的建议中强调,伙伴关系应为各方创造附加值,联合研究项目的设计应着眼于满足两国学生的需求。由于这些合作项目日益分化和德国大学加强努力以创建不同的机构特色,这些方面越发成为焦点。德国大学采用的国际化策略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抓紧一个机会(而不是系统地寻求机会)向一个真正的、协调所有院校成员相关活动的整体国际化战略发展。尽管这些趋势已经显现,2018 年一项由联邦教育部于联邦外交部委托的研究认为,虽然德国的大学已经开始重视探索并将中国视为一个关键的全球参与者,但是在学生、老师与研究者对于中国的了解和相关专业知识方面仍然需要加强。

基于坚实的价值体系建立伙伴关系

全球地缘政治发展和中德政治变革也对

两国制度性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目前正目睹不同的潮流交汇：虽然伙伴关系进程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经验，且联合项目继续在一些领域成功运作，但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已受到重大影响。

近年来，许多德国合作大学在与中方合作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法律要求和组织障碍。此外，国家对中国大学课程和管理过程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合作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合作关系完全停滞。

将大学的跨境活动锚定在稳固和健全的价值体系中变得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校长会议强调研究和教学自由是大学成功运作不可或缺的原因。鉴于全球舞台上的深刻变化，德国校长会议于今年 4 月发布了指导国际大学合作的指导方针和标准。

此外，德国校长会议最近还发布了关于大学与中国合作的指导性问题。它们通过详细描述与中国学术伙伴合作相关的必要性和可选的行动路线，补充了一般指导方针和标准。该指导意见是一种动力，以验证并在必要时重新调整与中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现有合作关系。同时，鼓励德国大学继续扩大在中国的学术努力，并积极形成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合作。

差异化方法是发展坚韧伙伴关系的关键

这些指导性问题旨在为大学作为机构和大学成员在与中国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和进

一步发展牢固的伙伴关系时提供动力、支持和导向。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三类：战略和治理；联合教、学、研；以及大学为跨国发展提供空间。这些问题探讨了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先决条件、要求和目标。德国校长会议认为，认真选择合作对象和合作伙伴是合作取得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合作的附加价值和可持续性同样植根于大学的结构和发展过程。此外，这些问题与大学如何定义自己、使命、概况、制度原则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德国校长会议认为，加强与中国伙伴在各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至关重要。这首先是由科学驱动的；然而，说服学生和研究人员与中国进行更广泛的接触，并以此更好发展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也符合社会的利益。在这方面，关键是要对个别伙伴关系的具体参数、目标和内容进行细致的观察，因为这将有助于在需要时与中国伙伴探讨并说明相关问题，同时确定有益的发展路径。在讨论机会与风险时，我们必须在损害机构价值与标准的情况下积极发掘机遇所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全力支持其成员，以确保我们继续建立有坚实基础的学术桥梁，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注：更多信息请查阅

www.hrk.de/guidance_China_cooperation。

博士教育：全球视野

维克多·鲁达科夫、玛丽亚·尤德克维奇

维克多·鲁达科夫 (Victor Rudakov):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院校研究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vrudakov@hse.ru

玛丽亚·尤德克维奇 (Maria Yudkevich):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研究大学副校长、高等经济学院院校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yudkevich@hse.ru

世界范围内的博士教育呈现出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的趋势。这些趋势受到大众化和国际化、不断增长的研究需求、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和博士教育目的变化的影响。一方面,有一种增加灵活性的趋势,如发展以工作为本的专业博士学位项目与远程和兼职形式的博士项目,以及不同指导与学习模式的博士项目。另一方面,全球博士生教育体系的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学生、教师和研究生的流动,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这些有助于统一博士生教育的招生和学习过程,并对那些想在世界一流大学求职的学者提出相似的要求。然而,这种统一的过程只影响到顶级大学,一般不影响国家博士教育体系的完整——这也促成了国家内部的院校差异。

全球差异的起源

一个国家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兴起时选择的模式以及之后改革的影响。在其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各国都采用了其他成熟学术体系国家的博士教育模式或要素。例如,有些国家采用了德国的模式,它非常注重博士期间的研究工作。有些国家则采用了苏联和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两步

式博士生教育制度(要求两篇论文)。也有其他国家采用了美国的模式,这种模式结构更加合理,包括大量的课程作业。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科学领域有几个不同的领先国家,许多国家的博士生教育都是将这些领先国家的最佳做法合并而成的,并加以调整以适合国内和国内院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的书稿《博士教育的趋势和问题:全球视角》(Trends and Issues in Doctoral Educ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分析了全球博士教育的主要趋势。

劳动力市场结果量表

在过去 20 年里,由于大学不断增长的研究雄心和高等教育体系扩张对师资的需求,博士毕业人数大幅增长。人们经常提到,全球博士生供过于求。然而,我们必须区分许多高等教育体系不断扩大的低收入国家和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情况,前者迫切需要博士毕业生,后者博士毕业生确实供大于求,在学术界面临就业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博士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糟糕,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这解释了博士后就业形式的传播,并强调了业界作

为博士毕业生就业目的地的重要性。

国际化

在国际化方面，英语国家和可用英语进行论文写作和答辩的国家在吸引国际博士生方面具有重要的竞争优势。博士教育的悠久历史（如德国）或曾经的殖民程度（如法国，有大量来自前殖民地的博士生，这些殖民地正在经历高等教育扩张），都是预测国际博士生高数量的因素。巴西、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是地区强国，主要吸引来自邻国的学生。

培养博士的过程和类型

不同的博士项目过程存有巨大差异，即项目长度、水平和考试，以及不同类型的博士项目、学位论文和指导，都影响了博士的完成率和流失率。在世界各地，兼职和远程博士项目的数量在稳步增加，然而这也提出了质量和学习成果的问题。虽然各个国家和学科的博士项目一般来说持续3~5年，但项目的时间长短有一定的异质性。尽管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如德国、波兰和俄罗斯）仍然存在一些两步走博士学位的元素，随着博洛尼亚改革的实施，这些系统正在逐渐消失。以研究为基础（主要在欧洲）和以课程为基础（主要在美国）的博士教育方法是有区别的，但大多数国家逐渐转向以课程为基础的博士教育。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论文要求的变化，即越来越强调研究发表。

知识导向型经济对新领导人的需求、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以及对技能缺乏关注的广泛批评，导致了博士教育目的的改变。博士项目不再局限于为学术劳动力市场培养新的学者。这导致了专

业博士项目和以工作为本的博士项目的发展，特别是在会计、金融、法律、医学和护理等领域。

资助及学生身份

博士教育的资助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免费的、以学费为基础的、由奖学金和贷款支持的、或者用工资支付的形式。在中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学费很高，经济上的帮助取决于项目、研究项目或大学的资助。德国在学生学习期间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使博士教育成为对全世界有才华的年轻人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一些博士生需要支付学费，但这些学费相当低。在大多数博士生制度中，包括在英国和美国，博士生被视为学生，而在德国、荷兰和一些北欧国家，博士生具有大学雇员的身份。

新冠疫情的影响

与所有其他学生一样，博士生也受到当前疫情的影响。许多人无法完成他们的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设备的项目。有些国家缺乏与顾问和学院系所的沟通和支持。对于今年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来说，形势非常不确定。疫情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增加：美国几所主要大学的博士学院已经宣布，他们明年将不招收博士候选人进入他们的项目，以便“将资源集中在现有博士生的工作上”。大学必定需要时间来全面恢复其培养新学者的职能。

注：本文概述了《博士教育的趋势与问题：全球视角》（Trends and Issues in Doctoral Educ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一书的内容，该书由尤德克维奇、阿特巴赫与德·维特编辑（Sage出版社，2020年）。

非洲：博士教育面临的资源挑战

温德伍森·塔姆拉特、哥特尼特·提萨组·费特尼

温德伍森·塔姆拉特 (Wondwosen Tamrat): 埃塞俄比亚圣玛丽大学 (the St. Mary's University)
副教授、创校校长

电子邮箱: wondwosentamrat@gmail.com 或 preswond@smuc.edu.et

哥特尼特·提萨组·费特尼 (Getnet Tizazu Fetene): 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Addis Ababa University) 教育规划与管理系教育社会学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getnet.fetene@gmail.com

博士研究对知识进步的贡献是公认的。

在非洲大陆，博士教育由于其关键作用和对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潜在贡献而被特别推进。因此，博士研究和非洲发展研究之间的联系在公共话语、政策方向和项目扩展计划中得到了强调。人们认为，建设非洲大陆的研究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可以通过支持提供研究生课程（特别是博士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来满足。

尽管整个非洲大陆似乎都认同这一基本假设，但博士项目在提高非洲大学教育质量方面的关键重要性也得到了承认。后者是由于需要提高教师的学术资质，而非洲大陆许多大学的教师严重缺乏学术资质。然而，尽管人们对扩大博士学位项目的兴趣日益浓厚，但在非洲和低收入国家的博士教育总体上充满了诸多挑战。

在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考察了博士生对博士项目的支持计划和资源的看法，资金和资源问题被认为是阻碍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Addis Ababa University, 埃塞俄比亚的一流大学，并培养博士生的主要学校) 博士教育进展和成功的最关键问题。

资源可用性

研究显示，博士生对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设施、个人工作或学习空间、图书馆和电子研究资源和服务、图书馆馆藏的质量以及实验室、临床或相关物理设施的可用性等资源的标准和可用性表示不满意。

博士生对设施充分性的总体评价非常低，非常令人担忧。就确定的特定类别而言，实验室、临床、工作室或其他物理设施的可用性的得分仅为 1.65 分（最高分值为 5，标准差[SD]=0.99）；个人工作或学习空间的可用性评分为 1.91 (SD=1.13)。对于资源的缺乏，博士生们显然有很高的共识，这肯定会对他们的博士学习生涯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发现，这个结果与当地早期研究一致，设施和资源贫乏，缺乏实验室和学习材料，缺乏博士学生的办公室或工作空间，以及这些相关的资源缺乏被认为是多数埃塞俄比亚大学研究生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许多非洲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博士教育扩大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扩展发展成功博士教育所需的设施。

财政支持的可用性

在许多非洲国家，博士学习的资金支持

问题已经被反复确认为一个重要的激励或障碍。在本研究中, 博士生对学校提供的财政支持和相关的支持计划的评价是差的。在满分 5 分的情况下, 博士生的评分从平均分 1.18 (SD=0.68) 到 2.53 (SD=1.13) 不等。评价最低的一个类别是参加会议或研讨会的资金支持, 超过 92% 的受访者说他们得到的援助很糟糕。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因为这不仅制约了博士生的成功, 而且也会限制博士生发展其研究能力和技能的机会。

博士生面临的财务挑战似乎是该体系的一个共同和突出特征。大多数项目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准备, 也没有部署足够的资源。在分配给博士研究的预算方面,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分配给每个学生的资金直到最近还只有 25000 比尔 (约 781.23 美元)。意识到进行博士研究的费用会很高后, 该大学被迫使用其国内收入和从国际发展伙伴获得的外部资金来补充学生拨款。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 最近该校社会与人文科学专业的博士生研究预算增加到 45000 比尔 (约 1406.25 美元), 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的研究预算增加到 60000 比尔 (约 1875.00 美元), 但在博士生看来, 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一位博士生表示对资助计划的不满时说道: “如果博士生应该进行对国家有用的研究, 那么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但是, 目前的财政支持非常低。根据我的经验, 这笔钱还不够交通费。在有安全问题的地方, 应该乘坐飞机, 但是预算连这个部分都无法涵盖。有关方面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够的。我认为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问题在于没有重

视这个问题, 没有改善这种状况。”

比博士生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更令人担忧的是, 现有的经济紧张状况正迫使他们误导研究重点, 并影响到他们的学术产出质量。一位博士生观察到。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大学得到的钱是有限的, 博士生试图让他们的论文题目适合某些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和活动, 目的是获得一些资助。这意味着博士生所做的研究不是出于他们的兴趣, 也不是为了解决国家问题。他们通过将自己的课题与潜在赞助机构的兴趣联系起来, 从而获得这些机构的一些资助。”

这表明, 大学的财政挑战正在威胁通过博士教育提高研究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是发展博士教育的主要理由。区域一级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类似的模式。大多数非洲国家在研究、创新和发展方面投入很少, 这对扩大博士项目和促进高质量产出有直接影响。

结语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预见的是, 埃塞俄比亚的博士教育本身和研究产出的质量都不会帮助实现博士教育的目标, 除非在改革国家指令、资源和支持机制方面做出重大改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非洲大陆的许多高等教育系统: 这些系统里, 尽管鼓励扩大博士教育, 但很少关注如何满足成功开设博士课程的要求。未来的努力应该集中在解决现有的限制, 而不是在没有适当财务规划的情况下开设新的博士课程。

日本大学博士申请人数下降——创新危机？

新见有纪子

日本东北大学高等教育卓越研究所高级讲师

电子邮箱:shimmi@tohoku.ac.jp

博士毕业生被视为创新的引擎，在领先国家，博士毕业生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2017年，美国博士学位或同等学位的毕业生人数从57407人增加到71042人，英国从18756人增加到28143人。然而，日本的这一数字从15867下降到了15674。更重要的是，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年度调查，在日本，博士项目的新入学人数从2003年的峰值18232人下降到2019年的14976人。国际博士生的数量在这两年中大致保持在2643名和2664名的水平，在这些学生中大多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他们的比例从14.5%增加到17.8%。虽然日本大学的国际博士生人数一直在增加，但到目前为止大学院校似乎无法弥补日本本国博士生人数的总体下降。

背景及潜在原因

博士项目在日本年轻人中不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博士学位无助于提高他们在日本公司的就业能力。此外，博士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并不一定高于硕士学位毕业生。在日本，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博士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培训未来学术界的教师和研究人員。1991年以后，研究生院培养高技能专业人才的能力增加了约2.5倍。然而，由于博士项目旨在培养毕业生从事学术工作的悠久传统，在博士教育期间所发展的

技能与日本公司所期望的技能之间存在不匹配。在2012年日本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的一项调查中，许多日本公司报告称，尽管博士学位获得者拥有专业知识，但他们很难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立即应用到公司的需求中。这个问题也适用于那些想在日本公司找工作的国际博士生。

此外，大学学术生涯变得不稳定，这也削弱了日本年轻人想要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随着日本国立大学在2003年遭受预算削减，这种情况变得明显起来。根据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的数据，2012年，大约60%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学或公共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然而，其中超过60%的人得到的是非终身职位，70%合同期仅为三年以下的合同。非终身雇员的工资往往低于拥有终身职位或在私营公司工作的员工。此外，短期合同使得年轻的研究人员很难选择和从事长期的研究课题。这个问题也影响到国际博士生。根据同一份报告，国际博士生倾向于应聘学术职位。毕业后，超过一半的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

日本年轻人不攻读博士学位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支持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一些在日本学习的国际博士生获得了文部科学省奖学金，许多其他私人资助的国际学生获得了学费豁免。根据文部科学省2014年的报告，

近 5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没有获得博士学习的经济支持。日本科学促进会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提供的研究奖学金项目规模最大, 每月为博士生提供 20 万日元, 约合 1900 美元; 然而, 该奖学金只授予不到 5%的博士项目新入学者。此外, 日本大学的研究助理奖学金和教学助理奖学金的收入不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这与美国的情况相当, 根据 2019 年的《博士学位毕业生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美国近 80%的博士生主要以研究助理奖学金、助教奖学金、奖学金或助学金来资助他们的博士学习。

政府的回应

作为提高日本博士教育吸引力的一种方式, 文部科学省于 2011 年至 2019 年开展了一个名为“博士教育领先计划”(Leading Program for Doctoral Education) 的项目。在该项目中, 33 所大学的 62 个五年制博士项目获得竞争性资助来发展其博士教育, 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广阔视野的领导者, 无论是在全球学术界或业界工作。在许多这样的项目中, 来自私营公司的专业人士教授一些课程, 这些项目也鼓励学生在公司实习并到国外做研究。文部科学省的报告称, 截至 2018

年 3 月, 这些项目共有 1846 名学生, 其中 96.5%在毕业后找到了工作。这个数字高于当年日本所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 (15658 名毕业生中的 72.1%)。此外, 42.6%的文部科学省项目毕业生从事非学术工作, 例如在公司或政府机构, 这也高于总体比例 (25.1%)。

虽然“博士教育领先计划”在增加博士项目和非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系方面似乎是成功的, 但近期政府项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们往往受到一个固定期限的限制。到 2019 年“博士教育领先计划”结束时, 另一个类似的项目“卓越研究生院”(Excellence Graduate School) 已于 2018 年启动; 但它也是一个固定期限的项目, 基本上持续 7 年。2020 年 1 月底, 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讨论了提高博士项目吸引力的新目标, 包括增加对博士生的财政支持。据报道, 尽管细节尚未公布, 但文部科学省于 2020 年 12 月为约 7000 名博士生 (约占日本所有博士生的 10%) 提供了高达 290 万日元 (约合 2.8 万美元) 的资助。报道称, 这将是一个稳定的支持计划, 日本可以通过该计划提高其博士项目的吸引力, 并为社会和产业带来创新。

学术腐败能根除吗？

利兹·莱斯伯格

利兹·莱斯伯格 (Liz Reisberg): 国际高等教育的顾问、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员

电子邮箱: reisberg@gmail.com

在世界各国几乎每一个公共和私营企业中都存在腐败现象。在有私人利益可得的地方，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人通过作弊来利用机会谋取个人利益，通过他们的行为破坏他们所滥用的系统的完整性。高等教育也不能幸免。俄罗斯科学院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年的报告记录了由俄罗斯学者提交的 800 篇期刊论文被撤回的事件，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表明这个问题是多么严重和普遍。

在施密特 (Elena Denisova-Schmidt) 编辑的《高等教育中的腐败——全球挑战与应对》(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 Glob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一书中，世界各国的学者们认为，高等教育中的腐败是由于制度设计不当、学生和教授不完全了解不道德行为的定义、缺乏对后果的认知、个人处于困境时发现“捷径”似乎是唯一解决办法，以及受到个人晋升之路的诱惑而产生的。缺乏对道德和不道德之间界限的明确定义，又或缺乏对不同情况下诱发腐败行为的认知，使任何旨在抵制学术腐败的政策或程序的有效性变得复杂化。

很明显，许多国家和院校在引导学生和教师适应公认的国际学术诚信标准或解释这些标准为何重要方面做得还不够。在某些情况下，违法行为是无辜的，或者因为人们观察到在别人身上发生的腐败行为没有得到处罚，从而逐渐“正常化”此类腐败行为。虽然有些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不更好地

理解它们发生的原因，就无法解决它们。

捷径和不正当的激励

也许从这本书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仅仅通过惩罚那些被发现有不道德行为的个人，是无法根除腐败的。许多国家的制度对作弊或忽视作弊存在不正常的结构性激励。亚美尼亚、立陶宛、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教员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境地，要么忽视作弊行为，要么开除学生，而这些学生的学费支撑着他们所在的大学。

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扩招的结果意味着更多的学生没有做好准备就进入了高等教育学习。在缺乏学术支持服务的地方，就存在为了成功而作弊的动机。合同作弊 (contract cheating)，即学生雇佣第三方来完成学业的行为，是其后果之一。在某些情况下，学生们会因为学习压力而求助于此。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可供购买的论文。出售论文的代理机构经常明目张胆地这么做，有时就设在校园附近。“论文作坊”不仅服务于购买论文的学生，也服务于撰写论文的作者。例如，在肯尼亚，由于该国经济疲软，合法就业机会有限，大学毕业生经常在网上销售论文。如果有任何打击“学术写作”行业的协同努力，肯尼亚的政府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问题。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某种程度上贬低了大学学位价值。在许多国家，即使是不

需要更高层次技能的职位，大学学位也已成为一个基本资格。其结果是，市场上有一部分人想要获得学位证书，却没有投入时间或精力去获得学位。对于这些人来说，从学位工厂 (degree mill) 购买一个学位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学位工厂可以提供任何级别的学位证书，而学习成本只是一小部分，几乎不需要投入时间。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组织做出了努力，但事实证明不可能建立一个完整的数据库来记录促成这种欺诈行为的企业。

商业风险投资满足需求

当学术界的就业和晋升取决于出版物的数量时，个人将不可避免地诉诸于“掠夺性期刊” (predatory journals)。掠夺性期刊的泛滥满足了这一需求，但也使区分掠夺性出版物和合法出版物的任务变得复杂。由于缺乏审查众多现有期刊所需的资源，试图发展一份相关的“黑名单”的努力受到阻碍。

掠夺性会议也是一个类似的挑战。组织者发现，他们的听众很容易接受，尤其是那些需要建立自己简历的年轻学者，或者是那些被邀请参加会议而受宠若惊的人。此外，还有一种吸引力是，可以获得大学的会议旅行经费，结果是即使来自精英机构的学者也会参加。不幸的是，各种类型的机构都在主办这些活动，将其视为收入来源。

最后，足智多谋的“第三方”充当中介，将未来的学生安排到国外的大学（最常见的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虽然这种做法在道德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取决于谁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但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如：对学生和学生的家庭来说，它缩短了在过去的国际选择中进行分类信息的复杂过程；对大学来说，它带来了全额付款的学生，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招生精力；

对充当中介的代理人来说，这种安排是有利可图的。

补救措施

消除高等教育中的腐败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也许最重要的是，需要让教师和学生了解什么是学术腐败，并解决鼓励不道德行为的根本问题。如果学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日制学习中，就需要有机制来缓解经济压力。当学生努力平衡学习时间和工作需要时，就会出现通过作弊来有效利用时间的诱惑。此外，担任公职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人，其经济、专业或学术利益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除非能够识别和防止利益冲突，否则腐败将盛行。

本书中试图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衡量成功的方式所造成的问题。只要获得学位的过程主要由考试和论文来衡量，小抄、冒名顶替、技术和论文制造厂就会为获得所需的结果提供一条诱人的道路。其他衡量学生学习的机制可以消除许多这些通往毕业的捷径。同样，如果教师的成功是以数量来衡量的，那么非法的选择仍将具有吸引力。当卓越的教学和对机构的服务受到更多重视时，腐败的机会就会减少。

结语

高等教育是创造当今知识型经济所需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根本。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公民需要信任大学来保护他们“产出”的完整性和质量。

阅读这本书时，人们不得不惊叹如此多学术腐败形式的“创新”程度。如果这些创造性的努力能更多地被道德地运用，那么世界上的大学所能取得的成就将是多么的伟大！

买还是不买？——在乌克兰“投资”一篇论文

阿拉拉特·L·奥西皮扬

阿拉拉特·L·奥西皮扬 (Ararat L. Osipian): 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新流亡大学联盟 (the New University in Exile Consortium) 研究员

电子邮箱: araratos@yahoo.com

许多中低收入国家, 包括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 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市场转型。在许多情况下, 尽管转型的时间很长, 但不同的政治体制所进行的市场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大规模的垄断、半封建、高度腐败的国家经济并不具有发达和竞争的市场。然而, 有一个市场显然是个例外, 因为它的产品很特别——博士论文。那些使用此类产品的人由于缺乏成熟的技能而破坏了国家经济。可供出售的博士学位不再能代表学位持有者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在国际市场上, 学位持有者的价值并不明确。“幽灵论文”(ghostwritten dissertations) 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乌克兰在代写论文方面的情况

我在《教育经济学评论》(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上发表了一项长达十年的研究, 名为《博士教育中的腐败经济学: 学位论文市场》(Economics of Corruption in phd Education: The dissertation Market)。研究发现, 俄罗斯有 169 家公司在代写学位论文。当时乌克兰只有 16 家这样的公司。我最近的一项研究《让我为你写一篇论文: 博士学位欺诈行为微观层面的成本效益方法》(Let Me Write a Dissertation for You: The micro-level cost-benefit approach to doctoral degree fraud) 发现, 有 46 家公司在乌克兰提供代写论文出

售。此外, 还有大量的个人学者(类似的自由作家) 试图以代写论文获取适当报酬。这些公司和个人代表了待售论文市场的供应方。人们可以在自己选择的任何领域主题购买论文。对这些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有抱负的博士候选人、教师和已经受雇于高等院校的管理人员、执业医生、公务员、政治家和商人。虽然商人对博士学位感兴趣是为了声望和声誉, 但其他潜在客户显然有经济原因。

撇开道德和伦理的考虑

我在乌克兰进行的实地调查结果表明, 伦理考虑和职业行为问题在这类决定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相反, 货币问题主导着决策。购买学位论文作为一项长期投资, 对想要获得博士学位的潜在客户很有吸引力。他们必须考虑到在学术界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合法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成本, 尽管从长远来看, 博士学位会带来一些好处。除非一个人在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工作, 或是医学专业人员或公务员, 担任公职, 在军队或执法机构服役, 或计划成为一名政治家, 否则拥有博士学位的任何好处都是值得怀疑的。私营部门, 包括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 并不重视员工和企业主的博士学位。因此, 博士学位造假与公共部门密切相关。

获得博士学位不断增加的成本

乌克兰仍然有一个双重的博士学位体系，第一级是副博士学位 (kandidat nauk)，更高一级是科学博士 (doctor nauk)。虽然前者最近被重新命名为“PhD”以指代西方的学位，但从本质上讲，这一体系几乎没有改变。获得博士学位需要撰写论文并进行答辩。学术著作的准备和出版也是必要的。所有这些要求都可以购售。购买副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作品、推荐信和对“副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这些要求的总成本大约为 5000 美元。这是根据各公司公布的最低（基本）价格的平均数而得。这个套餐的最高价格可达 19000 美元，几乎是平均基本价格的四倍。对科学博士学位的价格要高得多，学位论文、学术著作、推荐信与论文评审的总费用约为 25000 美元，最高价格可达 82000 美元。由于考取副博士学位是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必要先决条件，后者的最高价格超过 10 万美元。如此高的价格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也是不合理的。的确，在一个典型公立大学的副教授每月只能靠 300 美元甚至更少的收入过活的学术体系中，谁会愿意花至少 5000 美元来获得一个研究生学位？然而，提供此类服务的机构从 16 家增加到 46 家的现象，可能说明了人们对博士学位的需求在增加。

除了上面列出的成本，还有其他成本，

包括那些有时被称为腐败的直接成本。对于博士候选人，尤其是那些购买代写论文的人来说，贿赂博士委员会成员以换取答辩和积极投票的做法并不罕见。此外，奢侈的宴会和礼物被认为是这种腐败传统的自然组成部分。最后，成本还包括文书工作。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授予博士学位之前，必须向教育部和科技部提交一套必要的文件。这些文件也可以由那些提供代写论文服务的人收费撰写。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不那么重要的费用。这些费用使得学位的成本甚至高于最初成本效益分析中使用的平均价格。

获得博士学位后能获取回报

尽管如此，收益还是可以抵消成本的。无论是在公立、私立学院和大学，还是在公共部门，拥有博士学位的人都有机会获得高得多的薪水。福利还包括在学术界或官僚阶层中获得更高的职位，以及获得更高的退休金。工作保障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坦率地说，博士学位是一张工会卡，提供安全和滚雪球般增长的福利。此外，在乌克兰这样一个腐败的国家，教师和政府官员通过贿赂的形式产生非法收入，以补充他们的合法薪酬。这种非法收入可能经常超过正式收入。博士学位带来的资历也可能带来更高的非法收入，并扩大腐败的机会。

虚假的机构隶属关系和博弈性大学指标

维维安·C·巴切莱特

维维安·C·巴切莱特 (Vivienne C. Bachelet):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hile) 医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件: vivienne.bachelet@usach.cl

2019 年 6 月, 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在香港举行。会议由香港大学主办,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人员、政府官员等。此次大会中的一个主题会议专门讨论了研究资助机构在发展负有责任的研究实践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对其所在大学研究诚信政策与实践进行了概述。清华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中排名亚洲和中国第一。在其演讲后, 有一位与会者非常直率地询问并质疑了中国大学向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支付费用的政策。这位与会者的问题背后的假设是: 向科学家支付发表论文的费用有违科研诚信。薛教授的回复是: 清华大学十多年来没有向发表学术论文的科学家支付报酬。

发表论文的酬金奖励

向在高影响力期刊上、Scopus 或科学引文索引 (Web of Science) 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支付酬金奖励, 这种做法有问题吗? 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都非常普遍, 指导最近猜被禁止。在智利, 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对发表的论文支付酬金奖励, 而酬金奖励是根据期刊或索引服务的排名而定的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的文章比 Scopus 期刊收录文章的酬金高)。

这一政策背后的驱动因素是鼓励只教书的学者开始进行研究和出版。许多新兴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仍在努力巩固科研文化, 这似乎是提高其生产力并因此在大学排名体系中提升名次的简单方法, 这些排名体系大多严重依赖科学引文索引或 Scopus 的数据。虽然这种做法似乎不为西方科学文化所赞同——有些人可能认为这违反了研究诚信, 但其他人认为这种广泛的政策是一种提高科学家生产力的方式, 从而提高机构的声望和声誉。无论这种奖励系统如何运作, 其重要的客观成分是对作者机构关系的报告。

大学是否在购买出版物?

对于那些有意提升自己在国际排名体系中地位的大学来说, 刺激研究文化的酬金奖励可能已经变异为一种不同的游戏方式。提高大学的排名会带来很多好处, 因为更高的排名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学生入学和收入。

智利的大学正在使用许多机制来利用这个体系, 例如鼓励作者在提交稿件署名时加入大学的名字, 而这些大学并非对研究作出贡献或为学者提供资助。有一些智利私立盈利性大学接触外国研究人员的案例, 这些学校为这些研究人员提供酬金奖励, 鼓励他们在下次提交给高影响力期刊的论文中加入该大学的从属关系, 即使这些作者与该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大学提供的酬金奖励也能吸引

诸如教学医院等独立临床研究人员兴趣。虽然作者的真正任职关系是其工作的医院，但由于酬金奖励，在论文最终发表时会将大学列为任职院校之一。同样地，在众多大学教授课的临时导师可能会货比三家，寻找论文酬金数额最高的学校，或者更好的是把这些酬金都收起来；在最终交稿时，作者有时会显示有多个任职院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大学为西方大学的著名学者提供名誉职位，有时是以合同的形式，期望这些学者在发表论文时能将这院校列为任职机构。

对排名的影响

因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职机构，但更重要的是任职院校。排名和质量认证体系以及大学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上榜或衰落”（rank-or-wither）的文化。排名机构使用的许多指标（如诺贝尔奖）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调整，但生产率（产出）则容易得以改变。由于大学的国际化和合作研究项目的增长，学者拥有多个附属机构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可以说是标准化。

因此，大多数论文，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论文，都有许多作者，而且他们中的一

部分可能罗列了多个任职机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一位通讯作者提交论文时，作者署名部分都是自我报告的。但令人惊讶的是，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对如何正确填写署名中任职机构的建议，作者依靠自己的最佳判断并取决于利害关系来填写一个或多个任职机构的从属关系。然而，我们知道所列出的任职机构从属关系是真实的吗？利益相关者要在多大程度上核实从属关系是否正确？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试图检查并核实了罗列多个任职机构的作者的情况（其中至少有一所为智利的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有 38% 的任职情况无法通过公开可用的手段得以证实。

当指标成为支撑许多重要的高等教育政策定义的驱动力时，用于建立这些指标数据的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我们的研究之外，研究诚信与出版伦理领域的组织似乎很少甚至没有兴趣去看看房间里的这只“大象”。如果全球高等教育系统要继续使用学术出版物作为衡量院校质量的一种方式，就必须确保不存在博弈。这些影响是深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让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包括大学、排名机构、期刊、资助者以及研究诚信与出版伦理的组织等。

巴西高等教育的悲剧

马塞洛·诺贝尔、费尔南德·里尔

马塞洛·诺贝尔 (Marcelo Knobel): 巴西坎皮纳斯大学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 校长, 巴西格列布·瓦塔欣物理研究所 (Gleb Wataghin Physics Institute) 教授

电子邮件: knobel@ifi.unicamp.br

费尔南德·里尔 (Fernanda Leal):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 (Universidade Federal de Santa Catarina) 人力发展与管理教务长行政助理、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前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fernanda.leal@ufsc.br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总结了自 2019 年 1 月雅伊尔·博尔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总统上任以来巴西高等教育的重大政策变化。从本质上讲,我们提到了该领域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争议和阻力:科学和公共高等教育机构受到的预算限制;总统对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教育部以新自由主义观点提出的“未来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增加联邦公立高等教育的财政自主权,同时加强对它们的控制机制。

在本文中,我们将继续这一反思,呈现我们所谓的“悲剧年表”,回顾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巴西高等教育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表明,尽管公立高等教育部门已被证明对抗当前的新冠疫情至关重要,但联邦政策仍在继续威胁大学自治。

更多的不确定性、争议和阻力

博尔索纳罗总统所提出的政策对于高等教育的显著影响之一是,高等教育部门的发展会因这些政策而不稳定。他的许多措施都是在没有与大学和代表协会进行任何对话的情况下实施的,导致了强烈的抵制,倡议被取消或推迟。

自总统任期开始以来的第三任教育部长于 2020 年 7 月再次被替换。亚伯拉罕·温特劳布 (Abraham Weintraub) 前部长是第二届部长,任期最长 (从 2019 年 4 月到 2020 年 6 月),但其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由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对公立大学和学术界的敌意,温特劳布不得不离职。他这种有争议的态度走得太远了,总统已经不能再让他继续留任了。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时刻之一是温特劳布在 2020 年 6 月的一次小型亲政府示威中没有戴口罩——当时发生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他向示威者致意并宣称:“我不想要花钱培养更多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更多的哲学家。”

经济学家卡洛斯·阿尔贝托·德克特利 (Carlos Alberto Decotelli) 被提名接替温特劳布。然而,由于他的学历有几处不一致,包括信息不准确和剽窃指控,他没有被任命。今年 7 月,长老会牧师米尔顿·里贝罗 (Milton Ribeiro) 就任部长一职,他的一些言论引发了新的担忧,比如他暗示,同性恋是一个教育和价值观问题。总的来说,部长采取了非常低的姿态,但是,不幸的是,高等教育和科学的情况根本没有改善。

更多的预算约束

制约公立大学和科学经费的预算削减仍在继续，预计在 2021 年将会有更大幅度削减。2020 年初，联邦机构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 (Coordin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Personnel) 宣布了一个向研究生发放研究奖学金的新模式，优先考虑技术领域。同样，联邦机构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排除在 2020 至 2023 年优先资助的研究项目之外。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加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和科学技术发展国家委员会是巴西研究奖学金的主要资助机构。高等教育人才素质提升协调局还负责评估和认证研究生课程，因此，将研究经费限制在少数“优先领域”可能会使许多领域的发展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并对批判性思维产生严重影响。

由于联邦高等教育机构预计将在 2021 年在可自由支配开支 (支付、投资和学生援助) 面临额外 18% (约 1.85 亿美元) 资助削减，因此连续不断的预算限制将进一步扩大。11 月批准的一个项目已决定将相当于 2.6 亿美元的资金从教育部重新分配给基础设施和区域发展部，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联邦高等教育院校协会认为，这将损害教学、研究和推广/拓展活动，会对巴西社会产生直接影响。

行政自治面临更多威胁

在“未来计划”被绝大多数联邦高等教育机构否决后，政府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干

涉大学的管理。去年 6 月，总统发表了临时措施：如果校长在疫情期间结束其四年任期，教育部将指定其继任者。这就偏离了校长由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选举产生的长期完善的传统。但是，由于联邦政府对新冠肺炎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关注，因此这一措施似乎是一种干涉其自主权的手段。事实上，认为在疫情期间不可能投票选举新校长的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活动都是远程进行的，而且目前的技术确保了远程投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幸运的是，参议院推翻了这一决定，因为它偏离了巴西宪法。

根据宪法，选举过程首先要进行内部机构投票。然后，大学理事会向总统发送了一份列出前三名提名者的名单。自该国恢复民主以来，总统只需在名单上提名第一个候选人，尊重大学社区的选择。自 2019 年以来，博尔索纳罗总统在 27 所大学选举后提名了校长，但在其中 10 所大学中，他忽视了院校的选择。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总统的指定候选人甚至不在名单上。尽管没有义务，但接受学术界的意见是对大学自治与合法性的尊重，大学在军事独裁时期缺乏民主。一所复杂的大学由一个没有得到社区大多数人选择的人来管理，只会加剧学术环境中的紧张局势。

另一个担忧是联邦政府打算永久扩大联邦高等学校的远程教育。10 月，总统成立了两个工作组来计划这方面的策略。新冠疫情促使高等教育机构找到提供远程学习的方法，作为一项应急措施。然而，高等教育院校和代表机构需要解决和广泛讨论质量和学生能否获取技术支持等问题。近年来，随着公立高等教育覆盖面的扩大，越来越多来自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入学。不能忽视远程教育长期扩大发展所导致的数字技术不平等的风险。在尝试这种重大转变之前，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评估和减轻其在准入和质量方面的潜在影响。

矛盾的是，尽管公共高等教育系统遭受了所有的悲剧，但目前的时刻可能是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接近其周围的社区来强化其社会价值的一个好时机。经过多年无情的打击，同时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媒体给了教师们

更多的空间来发表意见，并强调研究对解决关键公共问题的重要性，如抗击病毒。公立高等院校负责了全国 95% 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声音对否认病毒的严重性和博尔索纳罗政府所宣传的“科学虚构说”是一个重要的反驳。试图压制学术界和控制大学的做法会使全国的民主、发展和社会福利面临风险，并损害了全世界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所带来的成就。

从迷雾中崛起：法国大学和全球排名

路德维奇·海曼

路德维奇·海曼 (Ludovic Highman): 英国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 管理学院高等教育
管理国际中心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教育系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 lah26@bath.ac.uk

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是自成一体的，其特点为分散的、分层的和多种类的。从 21 世纪初开始，法国一直在对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合理化改革，因为其大学在全球排名中表现不佳，令人失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政府发起的改革进程试图弥合高等学院 (grandes écoles) 和大学之间的鸿沟，鼓励历史悠久的大学重新崛起。为了理解为什么创建强大的法国大学具有挑战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法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从“学院共和国”到“大学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后，所有的大学都被废除了，其中许多大学最初是由教皇诏书建立的 (1289 年的蒙彼利埃 [Montpellier]、1339 年的格勒诺布尔 [Grenoble] 等)，它们在 1806 年被一个单一的全国性机构所取代，该机构被命名为帝国大学、法兰西大学，或者简称为大学。帝国大学被置于大法官或负责院系的部长的权力之下，对重新设立的院系 (即神学、法学、医学、人文学科和科学) 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些学院彼此独立发展，除了在大学的支持下之外，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

同时，高等学院 (grandes écoles) 的创建是以职业为目的的，即为国家提供工程和军事人才。这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机构，它在

大学部门之外培养法国的大部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1810 年柏林大学的成立对将洪堡模式引入法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 1896 年，位于同一城市的独立学院才被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身份之下运行。然而，损害已经造成，院长领导下的强大的教师力量压倒了任何由大学主导的集中行动，导致了所谓的“学院共和国”。

受那些借鉴美国模式的法国学者的启发，1968 年《福尔法案》(loi Faure) 最初试图创建自治的多学科研究型大学，负责自己的管理、预算和教育。尽管在中小型城镇建立多学科大学取得了一些温和的成果，然而“学院共和国”的影响太强大，难以抑制。在其他地方，大城市和首都的学科与政治联盟的力量证明是强大的，无法逆转，导致了围绕一两个广泛领域相关学科来创建“大学”，也就是以前的学院。

改革的动力

2003 年首次发布全球大学排名，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也被称为“上海排名”，造成了法国国内所谓的“上海冲击”(Shanghai Shock) 的现象。人们对法国各机构相对令人失望的表现感到惊愕。在许多情况下，法国精英的“高等院校”低于法国大学的排名，这个窘境对“高等院校”培养的精英来说非常令人痛心。这被认为是法国高等教育吸引力的障碍，也阻碍了法国知识型经济的竞争

力。

对于当权者来说，专业大学合并成多学科机构能带来什么好处并不明显，因为学科界限在学术界（和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政治精英们普遍缺乏兴趣，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然而，大学排名和研究型大学新兴全球模式（Emerging Global Model）的兴起结束了这种政治冷漠，对法国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对“最佳”大学进行投入：“卓越计划”

“卓越计划”（Initiatives for Excellence）于 2010 年启动，目标是发展 5 至 10 所世界一流大学。该计划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远比以往的激励计划（如“校园计划” [Plan Campus]）更有效，也是因为拨款的巨大规模和在大部门内实施差异化政策的目标所致。这意味着与以前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政策不承认大学之间或任何正式机构之间的地位或质量有任何差异。法国大学部门相对“扁平”的结构即将变得明显垂直分化。著名的“卓越计划”标签已被授予位于艾克斯-马赛、波尔多、格勒诺布尔、里昂、尼斯、巴黎和斯特拉斯堡等地的 10 所大学或机构财团，允许机构以政府批准的“精英”称号、并作为法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展示自己。

“卓越计划”尝试为院校提供必要的激励，以最终完成该部门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整合（2007 年首先通过科研与高等教育中心 [pôles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2013 年该中心由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社区 [communities of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取代）。该计划奖

励具有强大研究任务的大规模、多学科院校，要么是通过合并“高等院校”与大学，要么是通过在同一城市内合并专业学院。在 2019 年完成的最新合并中，巴黎萨克雷大学（the Paris-Saclay University）目前在全球排名第 14 位；同时，巴黎科学与文学大学（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和索邦大学（the Sorbonne University）都闯入了前 40 名；而巴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ris）和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Grenoble-Alpes University）则出现在前 100 名（请参见“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20 年的排名榜单）。

结语

有着如此惨痛的历史，法国大学很难站稳脚跟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高等教育系统深受其狭隘主义和自我划分的影响，一方面是为大多数学生服务的大型开放性大学，另一方面是培养专业精英、选择性高的小型“高等院校”，为学生在公务员或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做准备。

毫无疑问，排名最高的大学都克服了法国高等教育分散的本质，包括了其高等教育系统中两个重要的分支，即“高等院校”和大学部门。法国机构的质量并没有突飞猛进地提高，一直如此；然而，历届政府都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质量，并改革了高等教育格局，使其能够转化为并符合全球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规范和概念，以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新兴全球模式。

这种纵向分层的后果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对入学和学生选择的影响。通过恢复大学作为法国公共资助的教学和研究的主导媒介，政策制定者和院校领导层接受了洪堡模式和新兴全球模式提供的全球大学模板。

尚未涅槃：美国大选对国际高等教育的影响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界都对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即将离任感到欣喜若狂。他的离开直接和积极的变化，将影响美国和国际高等教育的格局。但特朗普主义远未消失。特朗普所代表的那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仍然是美国现实的一部分——也是许多其他国家的现实的一部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方面是反国际和反移民的倡导者和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另一方面是支持国际合作以帮助解决当地和全球的关键挑战的人，他们之间的分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快速的变化

虽然，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高等教育界继续参与国际事务，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言论产生了严重影响。

一些可能很快会被逆转的政策包括签证限制、仍在实施的“穆斯林禁令”内容、对学生签证的时间限制、对“专业实习”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简称 OPT) 和 H-1B 签证的严格规定等。有关博士后任命的规定将恢复传统做法。外国毕业生获得绿卡的程序将变得更加容易。儿童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简称 DACA) 将会恢复，该计划不会直接影响国际高等教育，但为 64.3 万移民提供保护。

现有的交换项目，如“富布赖特项目” (Fulbright)，曾受到威胁并遭受预算削减，将会安全发展。希望对国际发展存有争议的党派政治化将会结束。

总的来说，美国政府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的政策很可能会回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的标准。但随着新冠疫情的持续，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和经济混乱，不太可能采取新的举措。鉴于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坚定决心，高等教育中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海外学习和国际学生政策方面，将再次受到关注。但考虑到这些不平等和歧视问题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系统性存在，克服它们并不容易。

更广泛的趋势

总体而言，美国向拜登总统执政期的过渡将意味着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加强国际合作的基调将发生实质性转变，并将修改一些影响国际学生、教师和合作伙伴关系的严厉措施。但人们可能会想，是否有可能纠正过去四年对美国国际声誉造成的巨大损害。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可以说，在拜登的领导下，国际高等教育的状况不会比特朗普的领导下更糟糕，这本身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